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文库

PUERWENHUATONGLUN

# 普洱文化通论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李娅玲 著



# 普洱文化通论

P U E R W E N H U A T O N G L U N

▼ 李娅玲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洱文化通论/李娅玲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22-05982-5

I.普… II.李… III.文化史—普洱市 IV.K29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2711号

责任编辑:闵艳平

装帧设计:马滨

责任印制:洪中丽

普洱文化通论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思文库

李娅玲著

书 名 普洱文化通论

作 者 李娅玲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师范大学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222-05982-5

定 价 28.00元

## 《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思文库》总序

杜 巍

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博学之，慎思之。”说的是在治学穷理中，“学”与“思”相辅相成，二者不可偏废的道理。“学”一般指了解事实、获得相关的知识，“思”则是从事实和知识中获得深刻全面的道理。

“学”是“学其事”，“思”是探究其“所以然”。“学”是“思”的前提和基础，“思”是“学”的必然要求和深化。学有所思，思有所学，才会有收获、有所得、有所用。大凡有创新、有价值、有影响的学术成果，无一不是研究者经过由“学其事”到“穷其理”的过程，是“学”与“思”的成果。我校的学术丛书名之曰“学思文库”，就蕴涵此义。也许，我们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学思文库”的出版，倡导严谨求实的良好学风。

近年来，学校确立“质量立校、科研强校”的发展思路，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和资助力度，确定科研重点和主攻方向，整合资源，打造学术团队等一系列措施，为教师从事学术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学思文库”为我校教师展示学术才华、推出学术成果提供了园地。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思文库”丛书的编辑出版，对推动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提升教师队伍的实力，扩大学校的影响和知名度，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学思文库”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倡导学术文化的原创性和多样性，我们想要展现给读者的，是那些能彰显学术研究的个性和理性的见解和理论。凡我校教师的学术成果，只要体现出严谨的学风，科学的态度，观点新颖，材料翔实，逻辑严谨，论证有力，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哲学、社会科



学还是自然科学，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团队的研究成果、专著、论文，均在文库所收之列。

衷心希望我校教师静心于书斋，潜心钻研，著书立说，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充实和丰富“学思文库”。我们力求把高水平、高质量的论著奉献给读者。由于经验不足，知识水平有限，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憾，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 序

李子贤

大约是2005年初，承蒙思茅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杜巍教授的盛情邀请，笔者曾多次到该校为中青年教师做了几次专题性的学术讲座，并协助该校策划、筹备首届中国佤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有幸结识了该校的一批充满朝气与活力的中青年教师，李娅玲女士就是其中的一位。由于我们曾多次一道赴西盟、江城等县进行田野调查和进行研讨会的相关筹备工作，有机会就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的相关话题进行交流与沟通，李娅玲女士表达了对普洱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浓厚兴趣的意愿。两年后，我们在昆明又再次见面，当谈及李娅玲女士如何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时，笔者建议她不妨花一段时间对普洱地方民族文化的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梳理，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前人及当代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普洱茶文化为研究单位，撰写一本《普洱文化史》或《普洱文化通论》，为推进普洱乃至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不久之后，便得知她已开始了这项研究。今年年初，她撰写的《普洱文化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初稿就送到了我的手上，并委托我为该书写序。近日欣悉《通论》即将付梓面世，在我的脑海中油然而生一句古训：有志者事竟成。

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化学意义上的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逐渐兴起，并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门，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本土文化研究的学者，如楚图南、方国瑜、徐嘉瑞、马曜等，而且还有一大批活跃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知名学者，如费孝通、凌纯生、闻一多、杨成志、马长寿、李霖灿、马学良、江应樑、陶云逵等。长期以来，云南一直是贫穷、落后、蛮荒之地、瘴疠之区的代名词，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就将云南这块红土地的瑰丽、神



奇、博大、浑厚的人文景观展示了出来，人文研究风水宝地的迷人魅力开始显山露水，吸引了更多学人的眼球。自此，云南就成了许多国内学者的神往之地。八十年代以后，包括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共同参与的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得以全面展开，逐步蔚为大观，取得了一批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已为世人瞩目。进入新世纪以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呈现出基础性研究、整体性研究与专题性研究齐头并进的良好态势。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许多基础性研究的领域往往被忽略；在某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高端研究相对较少；对当下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变迁这一动态研究已有所触及，但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这一重大研究论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基础性研究领域中，其实有很多研究单位如怒江文化研究、红河文化研究、澜沧江文化研究等尚未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须知，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的充实、深化与提升，是以对云南诸多研究单位的深入研究并取得相应成果为基础的。笔者以为，在当今的文化语境中，云南本土学者应当在深耕本土上下工夫，同时要具有国际视野，走自己的路，这是至关重要的。应该说《通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的成果，而且也是深耕本土的一种尝试。

在云南多元一体、多源一体、多元共生、多元并存的少数民族文化格局中，普洱文化有其不可替代的特色及潜在优势。无论是历史上的普洱，还是当下的普洱，都是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最广泛的地区。时至今日，普洱市世居的少数民族几乎囊括了云南四大古代族群，即氐羌系的哈尼、彝、拉祜、白等民族，百越系的傣族，百濮（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系的佤族、布朗族，槃瓠系的苗族、瑶族，这在云南省的各州市中是很鲜见的。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里的茶文化、通道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傣族文化、佤族文化、拉祜族文化、哈尼族文化早已为世人所瞩目。

历史上，普洱文化曾经历过多次文化转型。其中，具标志性的有：至迟在明代，由于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导致傣族佛教化而产生的转型，之后傣族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如布朗族及佤族的一部分，则受在当地处于强势地位的傣族文化的浸染而产生的文化转型，即由信仰原始宗教转为信仰南传上座部佛

教。就历史上整个普洱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文化转型是明代以降，由于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汉儒文化的强势进入及长期浸染而导致的以汉儒文化为主导的汉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并存的这一格局的出现。不过，这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其影响面并不如云南中东部地区那么深广。这是由于：普洱地处边陲，汉族移民尚未深入到某些边远山区及边境地区，而且各少数民族在其长期的多元共生、多元并存这一文化语境中已形成了维系自身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使其能够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吸收、整合的过程中逐步做到丰富自我、提升自我，而又不丢失自我。

普洱的少数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够续存并保持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地域特征，除了传统文化的自我保护机制，历史上的地理隔离机制，受汉文化的浸染相对薄弱，普洱与中南半岛各国、各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等因素之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洱的各个少数民族及其支系，在这里逐步形成了许多既相对独立，又自成体系，宛如蜂窝状的“文化—地理单元”。这不仅使得当地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具有持久续存的根基，又让整个普洱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群落。仅以西盟县为例，这里虽然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区，但居住在这里的傣族、拉祜族却顽强地维系着自己文化传统，保持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现今西盟县城所在地附近，有一个名叫勐梭的傣寨，虽然只有近百户傣族，周边都是佤族（距离最近的佤族寨子仅七公里）、拉祜族，而距离傣族聚居区（孟连县）却数十公里，犹如悬浮在佤族、拉祜族文化海洋上的一个孤岛，然而她却完整、鲜活的保留着自己的传统文化。类似勐梭这样的文化孤岛，当然不止一个寨子。至今在普洱的任何一个县，情况亦大致如此。此种文化分布格局，让每个民族的文化既连接着古老的历史，精准地定位和维系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又与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互交融，确乎使这里成为一块神奇迷人的文化绿洲。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除了对傣族、佤族、拉祜族的文化以及普洱文化中的某些事项（如茶文化等）进行过较深入的挖掘和研究之外，从整体上对普洱文化的梳理和研究则相对薄弱。令人欣喜的是，《通论》为读者呈现了一本对普洱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梳理和较深入研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填补了一项普洱文化研究的





空白。

《通论》虽然是一本具有某种开创性意义的著作，可资借鉴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但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首先，历史发展脉络清晰，特色文化事项鲜明突出。著者对历史上和当下纷繁复杂的普洱文化资料（文献的与活形态的）进行了广泛、深入、细致的搜集。这是一项不仅耗时而且艰辛的基础性工作，却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在此基础上，著者对头绪纷繁、内容庞杂的大量资料进行了精细的梳理、辨析与提炼，力图将普洱文化中最具特色和历史、现实价值的事项抽取出来，以普洱文化的历时性发展为经，各种文化事象之间共时性的内在联系为纬，既从总体上勾勒出普洱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又对普洱文化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做了精当的描述。《通论》的绪论及一、二、三章，对普洱文化的界定及个性特征，普洱文化的生态环境，普洱文化的孕育和滋生，普洱文化的发展和融合，都作了较为深入、准确的理论概括与分析。其中既有对普洱文化具有全景式的文化图像描绘，又有对普洱文化发展史略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著者对普洱文化的把握和理解程度，应当说是颇费匠心的。《通论》抽取出来做重点评介的茶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事项，确乎都有其显著的个性特点及鲜活的地域特色。

其次，著者在整体把握普洱文化的个性特征时，能够以多维的视野和比较的方法，准确抓住某些重要的特质。原生型文化、蜂窝状文化群落、多元文化的聚合与涵容、边缘性特征等理论概括，都是较为准确的。在论及普洱文化的地域和生态环境时，特别指出普洱文化有其既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显得十分重要。就整个云南而言，似乎也具有这一特征。云南既有着悠久的对外开放的历史，却又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这里既是一块十分富饶的沃土，却又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这种格局，普洱最具代表性。印度文化、中南半岛文化进入普洱地区的历史十分久远，至迟在唐代以降就已开始；汉文化的浸润始于汉代，汉族移民及汉文化的强势进入，始于明代。然而，普洱的某些少数民族（如西盟佤族）由于受制于历史、文化、交通及地域环境的制约，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缺少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少有与其他民族的跨文化交流而获得的历史发展

动因，该民族自身的传统因素对其历史进程的影响极大，其历史主要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即单向的“纵向发展”。这样，他们拥有的对话形式，就基本上只有历时态视阈的“我—我对话”（纵向的古今对话）。而一些在历史上早已产生了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乃至实现了文化整合的民族，如傣族、哈尼族，至迟在明代以后，就从单向的“纵向发展”转向跨文化交流互动的“横向发展”。这些民族的对话方式，就不仅只有“我—我对话”，还拥有了共时态视阈的“我—他对话”（横向的内外对话）。既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对于普洱这一既与缅甸、老挝有着漫长的国境线，又长期受汉文化影响的特定区域而言，必然导致这里的原生型文化与边际文化并存。如前所述，原生型文化只具有“我—我对话”的视阈，而边际文化（如傣族文化、哈尼族文化）就拥有了“我—我对话”及“我—他对话”的视阈。换言之，拥有边际文化特征的一些民族，其文化就在长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整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丰富与提升。反之，像佤族这样保持浓厚的原生型文化的民族，由于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较少，又使得很多非常古老的文化事象得以长期续存。普洱文化的丰富多样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通论》又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立足于现实，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解读普洱文化。通过历史来观照现实，力图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握普洱文化的未来走向，就具有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著者在谈及普洱文化的个性特征时，明确指出了历史上形成的普洱文化的某种局限性，例如封闭守旧、固守传统的山地心态，滋生于中国主流文化之外的边缘感觉，容易满足、安于现状的自慰情节等。这些论述表明了著者的一种心结：历史上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文化——普洱文化，面对当今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现代生活、现代社会、现代文化，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调适，即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因此，著者特意安排了“社会转型中的普洱文化”与“普洱文化的现代构建和未来走向”这两个专题作为《通论》的结语。这样，历史与当下就有了某种连接，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全新的普洱文化，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是《通论》不仅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而且还能从中感受到普洱文化的动态感与未来朝向。

当然，由于《通论》所涉及的面较广，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较大，对很多产生年代十分久远而续存至今的活态文化做历史性的梳理，难度较大。因此，《通论》在某些理论概括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或可商榷之处。通道文化、土司文化等未列专章进行探讨，笔者以为是一个缺憾。

文化是一种生存战略、意义之网，也是一种营生方式或生活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又是人类特有的“思想软件”。遗憾的是，人们往往肤浅地理解了文化这一概念，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就是典型的实例。事实上，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经济状态；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层级。以先进文化为指引，不断提升文化层级，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精神和文化要素，应当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要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寻觅出优秀的文化传统，加以继承与弘扬，而且要根据现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文化选择与重组，让文化成为真正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驱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论》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普洱文化，乃至重新认识云南文化，逐步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适应，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云南正在为建设民族文化强省这一目标而努力。在这一过程中，摸清自己的“家底”，对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作认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真正找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特色、个性及发展规律，逐步实现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之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最佳统一，当是地方民族文化研究者的历史使命。若能如此，就不仅可以为云南建设文化强省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而且也使云南的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具有明确的方向与活力。

2009年6月28日于云南大学

# 目 录

## PUER WENHUA TONG LUN

### 普洱茶文化通论

#### 绪论\001

- 一、普洱茶文化的界定\001
- 二、普洱茶文化的个性特征\002
- 三、普洱茶文化在云南文化格局中的地位和优势\011
- 四、普洱茶文化研究现状、主要任务与意义\013

#### 第一章 普洱茶文化的生态环境\016

- 一、既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016
- 二、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环境\019
- 三、多民族并存的人文环境\021

#### 第二章 普洱茶文化的孕育和滋生\023

- 一、原始文化遗存\023
- 二、普洱世居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源流\025

#### 第三章 普洱茶文化的发展和融合\051

- 一、普洱历代政区建置沿革\051
- 二、南诏、大理国时期普洱茶文化的发展\055
- 三、普洱土司文化的演变\058
- 四、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对普洱的渗透与影响\071
- 五、普洱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087

#### 第四章 历久弥芳的普洱茶文化\095

- 一、源远流长的普洱茶文化史\095
- 二、普洱茶与普洱少数民族文化的圆融\099
- 三、以普洱为源头的茶马古道\104

<b>第五章 多元并存的宗教文化\107</b>	
一、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108	
二、人为宗教的传播与文化交流\122	
<b>第六章 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135</b>	
一、绚丽多姿的传统节日文化\135	
二、因地制宜的生产习俗文化\141	
三、五光十色的人生礼仪文化\147	
四、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165	
五、异彩纷呈的服饰文化\168	
六、与自然和谐的民居习俗文化\179	
<b>第七章 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192</b>	
一、文化传承中的民族语言文字\192	
二、口承文化中的民族民间文学\196	
三、独具魅力的民族民间艺术\208	
<b>结语\231</b>	
一、社会转型中的普洱文化\231	
二、普洱文化的现代构建和未来走向\236	
<b>附录：普洱文化大事记\238</b>	
<b>参考文献\244</b>	
<b>后记\246</b>	

## 绪 论

### 一、普洱文化的界定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发展进程的信息载体，是表征社会成员特征和行为模式的综合体系。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构成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内涵，即区域文化。区域文化是人类文化独特的空间组合，它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步孕育而形成的，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传承性。

“普洱”先有地名，再逐渐向政区名称过渡。“普洱”为哈尼语，意为水湾寨，普洱作为地名是由唐代的“步日睑”演变而来。南诏设“步日睑”，大理为“步日部”，元初改设“普日思么甸长官司”，明朝洪武年间改作“普耳”，万历年间始作“普洱”。至清朝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普洱”始作为政区名称正式确定下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普洱文化。

普洱文化是形成和发展于云贵高原西南边缘横断山脉南延地带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它源于普洱这块土地，是生活在普洱之域的民族群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和培育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具有鲜明历史、民族、地域特点的边缘区域文化，内涵丰富，含有进步、落后、至哲、愚昧等各种文化因素，是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洱文化是以普洱命名的区域文化，因而首先要界定普洱的区域范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行政区划对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清以来的行政区划，在经过长期的文化变迁与文化整合以后，已经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质的文化区域。岁月的变迁虽然改变了古代区域的精确性，但这种模糊性的“区域”观念已经转换为对文化进行界定的一种标志，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头脑中，并产生了



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基于此，本书中普洱文化的区域范围是一个相对广义的地理概念，包括清代普洱府和民国初年普洱道历史上曾经管辖过的今景东、景谷、镇沅、墨江、江城、宁洱、思茅、澜沧、孟连、西盟、勐海、景洪、勐腊、沧源、双江、凤庆等县区的广大区域，主要涉及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临沧市的部分地区，是一个大普洱的概念，而非局限于今天的普洱市，时间范围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古代和近代。

## 二、普洱文化的个性特征

文化个性特征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受地理、人文等诸种因素影响而形成的具有独特色彩和个性的表征。它既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地域形态，也内化为一种潜隐的文化性格。就区域性文化而言，普洱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与全国各区域文化，尤其与云南文化存在共性，也有其地域色彩和个性特征，与我国其他区域文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普洱文化与云南文化的共性表现为多元一体、多元共生并存、多源一体。

“多元”即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发生；“一体”是多元文化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多元复合，形成共性，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共生并存”则是多元文化的相容、共存，“和而不同”、和谐发展。普洱一方面聚集了14个世居民族，民族文化表现出多样性、差异性，另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多样并未导致普洱各民族的离散与分裂，各民族和谐共处，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异质文化并加以整合，产生了许多带同质性的文化特质，并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祖国有着强烈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同时，这种“一体”的认同与凝聚，并不排斥和妨碍各民族始终保持和发展着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从而使得普洱在整体上一直显示出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所谓“多源一体”，即普洱各民族文化之源是多向的，同时又是相互交融的。每个民族文化中，不仅具有其所属的原始族群的古文化因子，而且具有诸种外来文化的因素。如傣族文化不仅具有百越系原始族群的文化因子，而且还有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东南亚文化和汉文化等诸种文化因

素的积淀<sup>①</sup>。

普洱文化的主要个性特征是：

### （一）原生性文化

从历史角度看，普洱文化是一种原生性文化，古朴、神奇。普洱地区气候温暖湿润、物产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哺育我国古人类的摇篮之一，是多民族频繁活动的区域。早在3000多年前，已有百濮、百越及氏羌先民在普洱居住繁衍生息，进行文化创造，在生产生活中留下了不同特点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普洱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曼蚌因类型为代表，它分布在景洪、勐腊、勐海、孟连、澜沧、思茅、宁洱等地<sup>②</sup>，以渔猎为主要生产方式。3000年前新石器晚期的沧源原始崖画中显示的狩猎采集场面，以及各民族神话、传说和创世史诗所呈现的表达方式和艺术形式，都折射出普洱各民族大致相同的原始思维。这些原始思维中蕴含的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神灵崇拜意识，以及宗教信仰、价值判断和道德取向，带有原初性，文化积淀深厚。

### （二）蜂窝状文化群落

从文化分布格局看，普洱文化是蜂窝状的文化群落，有众多相对独立、封闭的小文化圈，多种文化形态及多种文化模式并存，它们互有影响和交融，彼此犬牙交错，但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没有明显的占主流地位的文化，没有形成以某种民族文化为主体文化的局面。汉族文化作为一种统一的、比较先进的文化进入普洱，并未改变其他适应多样性环境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即使是同一民族，在不同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色。

北部的景东，虽然位于云南边陲，却因此远离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辐射。历史上文脉悠久，儒风盛行，文化先贤辈出，是普洱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最早、汉儒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地区，也是滇西南的历史文化名邦，被誉为“金景东”、“小中原”。从汉代开始，景东就是滇西南的重要信道，北通楚雄、昆明，南达普洱、

<sup>①</sup> 李子贤：《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sup>②</sup> 李昆声：《1949年以来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考古的主要成就》，《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西双版纳乃至东南亚诸国，西连临沧、德宏、缅甸及印度。景东毗邻北部的南诏大理文化和东部的滇文化，受彝族、白族和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以“重道崇儒、实行教化”为核心的中原汉儒文化源源不断地与景东各民族联结、交融和渗透，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明清时期，景东逐步被纳入儒家教化体系，出现了普洱地区最早的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学义学，入学读书、科举做官的观念深入人心。500多年中，共产生进士4人，举人118人，各类贡生276人，造就了翰林同治帝师刘琨、三省巡抚程月川，文人学子戴家政、曹鹤鸣、侯应中，著名教授徐劲等在当时政坛、学界、诗文方面有一定影响的文化名人。拥有文庙、卫城和林街清真寺三个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其中保存完好的文庙已有300多年历史；有《景东府志》等六部志书存史。儒家思想促进了景东地方奴隶制经济、封建领主经济的瓦解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保持了社会秩序相对长期稳定，步入文化礼仪之邦。

墨江、宁洱和江城地处云南哈尼族分布的边缘地带，其文化既保留了哈尼族文化的基本特色，又融入了其他文化的影响。靠近交通要道、汉族移民居住区和自然条件较好的哈尼族支系文化融合较大，边远地区的支系则保留了古朴的民族传统文化。尤其墨江是哈尼文化汇聚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生活着哈尼族13个支系中的9个支系，有着既彼此相同又各具特色的哈尼文化。历史上哈尼族聚居的马龙他郎甸（今墨江、宁洱、思茅一带）不仅为昆明经西双版纳直通缅甸的古道要驿，而且是有名的茶、盐产区，盐供临安，茶供全省，商旅往来甚为频繁。便利的交通不仅给当地带来所需的物品，而且南来北往的人们也给当地带来了新的思想和观念，促进了汉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所以，新中国成立前在墨江和宁洱等地出现了不少哈尼族知识分子。特别是驿道马帮，在内地汉文化向哈尼族社会渗透，或把哈尼族文化带到内地汉族地区的互动交流中，起到了特殊的积极作用，马帮不仅将商品经济因素引入到哈尼传统经济机体之中，而且还广泛传播交流各民族文化。墨江普益公园有一幅别具匠心的对联“金乌西坠矣打合依么，玉兔东升兮夺科腊司”，将汉语和哈尼语巧妙融合在一起，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反映了汉哈文化的融合。江城一碗水、洛洒发现的清朝哈尼族“牛宗碑”，分别刻有